

统合儒释: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*

□ 杨娟娟

摘要:王审知治闽期间,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,大力扶持佛教,推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,以儒家为主,以佛教为辅,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。黄滔是其最重要的谋臣,其文章充分展现了王审知这一治闽方略。

关键词:黄滔;王审知;统合儒释

中图分类号:K295.57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1-8402(2009)11-0092-03

从景福二年(893)王潮、王审邽、王审知兄弟攻占福州算起,至945年南唐灭闽止,闽国共存在52年的时间,其间王审知在位27年(898-925),占了逾半时间。这27年是五代闽国最为繁荣的时期,也是福建佛教的兴盛期之一。

正是由于王审知对佛教的大力扶持,使得佛教盛极一时。王审知之所以崇佛,除了自身信奉佛教的因素以外,还有更重要的原因,他是从晚唐、五代时期的闽地实际出发,推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,将佛教当成儒学治国的重要补充。作为王审知时期最重要的谋臣、策士,黄滔的文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。

王审知之所以会将佛教作为其治闽的方略之一,首先当与闽人对佛教之崇奉心态有关。闽国地处蛮荒之地,故而“闽俗好巫尚鬼”^[1],而当佛教在三国吴时传入福建以后,闽人就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。在隋唐时期,福建的佛教有了长远的发展,“唐代福建高僧辈出,一些高僧如怀海、希运、灵佑、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唐代福建名刹林立,一些全国、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,大都建于唐代……《三山志》卷第三十三《寺观》称当时造寺,‘殫穷土木,宪写宫省,极天下之侈矣。’可见这些寺院规模宏伟,富丽堂皇”。^[2]关于佛教在福建的兴盛,我们也可从黄滔的文章中略见一

斑。在黄滔文集中,收录有他为三位僧人撰写的碑铭,分别为《龟洋灵感禅院东塔和尚碑》、《华严寺开山始祖碑铭》和《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》,从碑文中可知此三人皆出自福建本地:

和尚法号志忠,俗姓陈,世居仙游。^[3]

师法号行标,俗姓方。祖荣父安,莆之盛族也。^[4]

大师法号义存,长庆二年壬寅,生于泉州南安县曾氏。^[5]

这几位僧人有的在福建本地颇有名气,如行标法师:“及宣皇帝复寺(大中元年丁卯师年六十七),刺史琅琊王公迎以幡花,舍于郡开元寺,俾为监领……刺史河东薛公仰其孤风,复驰开元之僧,卫以入郡。”^[6]“琅琊王公”和“河东薛公”指先后担任泉州刺史之王固与薛凝,开元寺乃泉州名寺,能让刺史以供佛用的幢幡彩花为礼聘为寺守,可见行标法师在当地僧人中的显赫名气。与行标法师相比,雪峰义存大师更是名满天下:“斯则庚寅,逮于乙未,师以山而道侔,山以师而名出。天下之释子,不计华夏,趋之如赴召。乾符中观察使京兆韦公,中和中司空颍川陈公,每渴醞翻而不克就饮,交使驰恳,师为之入府,从人愿也……僖宗皇帝闻之翰林学士,访于闽人陈延郊,得其实奏。于是圣锡真觉大师之号,仍以紫袈裟,俾延郊授焉。”^[7]义存大师不仅有来自全国的众多佛学弟子,还与福建观察使韦岫和陈岩相交甚厚,更被僖

* 本文为漳州师范学院科研资助项目(项目编号:SS07004)。

作者简介:杨娟娟,女,福建龙海市人,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,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。

宗皇帝赐予真觉大师的圣号,成为一代禅宗名僧。与此同时,许多福建民众还慷慨地将自己的家产施舍给了寺院,最有名的当数泉州的黄守恭,他将房屋等财产捐给了开元寺,自己迁居他处,使得开元寺成为占地辽阔的名寺。古田的雪峰寺也是由蓝文卿、蓝应潮父子施舍的,“晚唐五代福建寺院大增,主要是百姓捐献的结果”^[8]。名僧辈出、百姓崇奉,这就是王审知在福建推广佛教,并以之为统治手段的社会条件。

不仅普通的民众崇奉佛教,就连闽地的士人也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中国的寺院多依山而建,静谧的环境、平易的僧人使得这里多成为士子们苦读以求取功业的适宜场所,在福建亦然。“初侍御史济南林公藻与其季水部员外郎蕴,贞元中谷兹而业文,欧阳四门舍泉山而诣焉(四门家晋江泉山,在郡城之北。其集有《与王式书》云:‘莆阳读书’。即兹寺也)。其后皆中殊科,御史省试《珠还合浦赋》,有神授之名。水部应贤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誉。欧阳垂四门之号,与韩文公齐名,得非山水之灵秀乎?”^[9]在唐代的福建文化史上,林蕴、林藻、欧阳詹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,他们三人于贞元四年、七年、八年先后进士及第,欧阳詹还成为福建第一位甲第进士。不仅如此,三人还各擅美名:林蕴应贤良方正科所答策中有“臣远祖比干,因谏而死,天不厌直,生微臣也”之语,故而黄滔称其“擅比干之誉”;林藻应试《还珠合浦赋》中有“珠之去也,山无色兮氛雾冥冥,海无光兮空水浩浩;珠之来也,川有媚兮祥风习习,地有润兮主物振振”之辞,其座主杜黄裳赞此联“如有神助”^[10];欧阳詹积极参加了古文运动,与韩愈结下深厚的友谊,其卒后,韩愈撰《欧阳生哀辞》以祭之,文中赞其“志在古文”^[11],陈庆元先生称其为福建文人中“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”^[12]。正因为三人在福建历史上的独特成就,使得他们结伴读书的方式为后人所纷纷效仿。

正是由于佛教与闽人的密切关系,使得王审知治闽时,注重发展佛教,以期从精神上控制闽地普通民众甚至是文人名士。他在举办佛教活动时,往往大兴闽人之力:“举闽之高卑,举闽之少耄,攀之望之,无不动心涕臆。”^[13]无论高贵卑贱,无论男女老少,都加入到了佛教活动中来。在举办法会之时,王审知还广邀名士以体现其对于佛教的重视:

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,设二十万人斋,号无遮以落之。是日也,彩云缣天,甘露粒松。香花之气扑地,经梵之声入空。座客有右省常侍陇西李公洵、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昌黎

韩公偃、中书舍人琅琊王公涤、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、大司农琅琊王公标、吏部郎中谯国夏侯公淑、司勋员外郎王公拯、刑部员外郎宏农杨公承休、宏文馆直学士宏农杨公赞图、宏文馆直学士琅琊王公侗、集贤殿校理吴郡归公传懿,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,侍从之声齐褒向,甲乙升第,岩廊韞望。^[14]

这段文献为前人所广泛引用,因为它体现出了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建名士聚集的繁荣景象。但有意思的是,他们的聚首是因为一场佛教盛会。而韩偃又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。韩偃乃晚唐名士,深受唐昭宗倚重,受朱温排挤、迫害,被迫过流亡的生活,一路南下,入闽依王审知。然而由于王审知在朱温篡唐立梁之后奉之为正统,故而引起韩偃不满,但又无法离开闽地,所以只能寓居泉州南安,终老于此。霍松林先生尝云:“此是偃参与王审知活动之唯一记载,亦不过为宗教礼仪而已。”^[15]然而这恰可反映出王审知对此次无遮大会的重视,不仅设20万人斋,场面相当的壮观,还邀请当时在闽的11位当朝名士参与,就连与其政见并不太相同之韩偃亦在其中。

二

王审知之所以会将佛教当成治国的方略,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意识到儒释的相通之处,从而将佛学当成是儒学的有益补充,他说:

文武之与释氏,盖同波而异流。若儒之五常,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仁者含宏也,比释之慈悲为之近。礼者,谦让也,比释之恭敬为之近。智者通识也,比释之圣觉为之近。信者,直诚也,比释之正直为之近。而义者杀也,其为异诸武之七德。^[16]

王审知认为儒家所倡导之“五常”,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与佛家所提倡之慈悲、公正、恭敬、灵感、正直是相近的,这就是它们殊途同归之处。由于王审知在闽大兴佛学,或尝有人以梁武帝之事劝谏之:

或曰:“梁武帝之隆释氏,今古靡伦,奚报应之昧乎?”对曰:“梁武帝隆释氏之教,不隆释氏之旨,所以然也。夫帝王之道理世也,释氏之教化人也。理世之与化人,盖殊路而同归。彼宵旰于万有,故一夫不获,若已陨诸隍中。此济度于触类,故欲凡一有情,悉皆成佛。梁武帝则不然。以民之财之力,刹将三百,祈功凯德则归诸己。啼亿兆而不乳,削顶颌以言觉。所以私所以然也。”^[17]

梁武帝可算是中国古代帝王信奉佛教之典型,甚至放着朝政不理跑去寺院当起了和尚,后人因此将梁朝的灭亡部分归因于武帝的奉佛。对此,王审知有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梁武帝尊奉佛教并没有错,只是他忽视了治世理民与佛教化人之内在联系。其实,理世与化人是殊途同归的,理世讲求儒家的仁义、爱民,而佛教亦将救济众生脱离苦海作为其基本出发点。正因为梁武帝漠视了这点相通性,其理佛只为满足一己之私利,而不是以佛家普渡众生之心来治理民众,使他们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,最终才导致亡国灭身。王审知还认为“吾父国也,子民也,朝为社稷之计,暮作稼穡之念。若俾求智慧火,乾烦恼海,则非吾之所能。”^[18]作为一个统治者,不是要直接以佛理度人,更不是要亲身入佛,而是要化佛家之教义用于为百姓、为社稷服务之中。可见,王审知充分认识到了儒释的相通性,并将佛教当成儒学治世的有益补充。受王审知的影响,黄滔在其文章中也两次表达了相同的看法:

金圣人之教功与德,鲁圣人之教忠与孝。

以忠孝之祈功德,莫之大也。^[19]

黄滔《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》中云:“乃产金圣人于西国”,则“金圣人”即释迦牟尼,“鲁圣人”当指孔子,黄滔认为以佛教所倡导之功德来作为儒家之孝义的体现,是最合适不过的。他为佛教未能更早地进入中原,进而发生更重要的教化作用而深感惋惜,并认为在人世黑暗的时候,在儒学衰微的时候,佛教能以其悲悯之心来涤荡人们心中的苦恼与恶念,哪怕是再愚钝的人也会受其感染而一心向善,这样一来,佛教就成为治世的有效手段,佛学也就成了儒学的有益补充。

正因为王审知将佛教当成是儒家治世的有益补充,所以其佛学举动往往带有儒家忠孝的色彩:

天复元年辛酉,天子西巡,岐汴交兵,京洛禹禹。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,祀天地鬼神,以至忠之诚,发大誓愿。于开元之寺造塔,建号寿山,仍辅以经藏,乞车驾之还宫也……本于孝思荐劬,故冠之以报恩,此其义也。^[20]

今我公为邦则忠孝于君亲,牧人则父母于生民。造塔四,其一曰寿山,以昭皇帝辛酉岁西巡,发誓愿以祝熊罴,乞车驾之复宫阙。其二曰报恩多宝定光,追荐于先世。其三其四大中神光,为军旅也,为人民也。缮经五藏,其二进于上,其三附于寿山定光大王,意同乎塔。月三其斋,或千僧,或千佛。疏乎诚,首则君亲,次则军

旅人民,而已后焉。^[21]

在黄滔的笔下,王审知修寺、建塔、缮经、开斋等一系列的佛教行为都是为君王、为父母、为社稷、为百姓祈福的忠孝爱民之举,是其治世立国的有效手段。

王审知长于中原,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,而且举于乱世,亲眼目睹了晚唐民不聊生之状,故其明白要使百姓安居乐业,应当首先施行仁政,将儒家思想当成治国的根本,“始者我公之登坛也,其一之年,偃干戈,兴礼乐。二之年,陈耒耜,均赋舆。三之年,叠贡输,祇宠泽。万乘臣其职,四邻视其睦,百姓天其政。故一川之镜如,灵台之月如。融融怡怡,愉愉熙熙。乃大读儒释之书,研古今之理。”^[22]

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,王审知上台之始,首先推行的是儒道,保境安民、发展农业、减轻赋税、兴办学校、延揽人才,使福建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,进而才推广佛教。正是因为王审知始终是将佛教作为治世手段、作为儒学的有益补充,正确地处理了儒释的关系,所以他虽大兴佛教,但却并未危及统治;相反,统合儒释方略的成功施行,形成“三十年间,一境晏然”^[23]的繁盛景象,极大地推动了五代福建的发展与繁荣。

注释:

[1](明)黄仲昭修纂:《八闽通志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卷五十八,《祠庙》。

[2]何绵山著:《八闽文化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13页。

[3][4][5][6][7][9][13][14](清)董诰等:《全唐文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3857,3857,3857,3857,3856,3852,3855页。

[8]徐晓望主编:《福建思想文化史纲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,第61页。

[10](清)徐松撰,孟冬二补正:《登科记考补正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,第532页。

[11](唐)韩愈著: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301页。

[12]陈庆元:《福建文学发展史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。

[15]霍松林、邓小军:《韩年谱(下)》,《陕西师大学报(哲社版)》1989年第1期。

[16][17][18][19][20][21][22]同注释[3],第3853,3856,3852,3852,3855,3852页。

[23](宋)薛居正等撰:《旧五代史》,中华书局1976年版。(作者简介:1、厦门大学历史系,福建 厦门 361005;2、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,福建 漳州 363000)

(责任编辑:安然)